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现实价值

臧峰宇¹, [澳] 罗兰·博尔²

(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2.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NSW 2308)

摘要: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表达, 需要恰当的翻译, 也需要合理的释义。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我们应着眼于人类共同的命运, 摒弃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陈旧的思维观念, 为人类的未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 这个理念站在了人类命运的制高点上。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 它不仅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 对当今时代的社会建设也有普遍的启示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 它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有关, 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注, 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当代遵循, 是一项能够实现“双赢”的倡议。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内涵; 现实价值; 国际关系; 翻译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 (2019) 04-0009-09

罗兰·博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要的理念。显然, 他关注的是国际关系, 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首先我们来探讨它的英文翻译。这句话译成英文似乎有点难, 以往通用的中文翻译是“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但这种译法有许多潜在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译法, 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被译为“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这个理念, 它包括三个主要的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臧峰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2012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谈到,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风格, 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理解这个词的英文表达, 需要恰当的翻译, 也需要合理的释义。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译法, 我觉得十九大报告英文版的译法更接近原意, 当然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理解这个理念。我很高兴与你一起推敲这个概念的译法, 这确实并不容易。

收稿日期: 2019-01-14

项目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境界研究”(18JD710099)

作者简介: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院副院长、教授; 罗兰·博尔,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

一、东西方语境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罗兰·博尔：第一个词——人类，也许是最容易翻译的，因为它指的是“humanity”这个意思。我们所有人都包括在内。但这个术语从何而来？这是一个中国传统词汇，还是来自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想了解它是不是一个中性词。

臧峰宇：我认为“人类”在这里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我们所有人，体现了人在世界历史中的普遍性存在。

罗兰·博尔：第二个词——命运，立即就变得更复杂了。从字典上看，它有“destiny”“fate”“lot”这些意思，也有“发展趋势”的意思。但是字典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明白这个术语在中国语境中是如何被理解的，它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交叉点。或许你可以帮我迈出第一步。在此之后，重要的是要阐述“命运”在西欧语境中的含义，特别是因为这种翻译可能与在中国语境中的含义不同。

臧峰宇：“命运”确实是个复杂的词。《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讲的是古老国家的使命在于创新。当然，个体也很关心命运，《左传》中有一句话：“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人们关心自己能否如愿以偿地达到预定目标，把握自己命运的航向。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我想这里更多的是指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把握历史规律，在实践中改变过去、创造未来。

罗兰·博尔：非常感谢你对“命运”的中国来源的解释。理解“destiny”在西欧语境中的意义也很重要。最初，“destinare”这个拉丁文是一个动词，意思是修复或建立，由此确定一个特殊的目的或终点。在这个基本的意义上，它是相对中性的，意味着它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然而，它也与“fatum”这个名词有关。这是众神决定一个人的命运（“destiny”或“fate”）的法令。更详细一点说，古希腊有三个命运女神，她们是（时间）神柯罗诺斯和（必然）神阿南刻的女儿。罗马人在他们的信仰中借用了这个观念，所以，三位女神（他们称之为“Fata”）的工作方式大致是相同的：她们决定人们生命长度以及人们将忍受怎样的痛苦。这里基本的观念是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一个更伟大的力量控制它。这通常是“destiny”和“fate”在西欧语境中一直以来的意思。

臧峰宇：我觉得你阐述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关于“命运”的观念的关键含义。人们对生命中的很多事情难以把握，这表明人是有限的存在。古人经常将一些困境归为所谓的天意，就是你所认为有一个更伟大的力量控制这一切。宋朝有个宰相叫吕蒙正，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命运赋》，说人生的一切都是“时也运也命也”，“此乃天地循环，周而复始之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命和运有一定的区别：命是相对确定性的，运是可以转化的。孔子的弟子子夏也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宿命论在中国古代典籍和民间文化中很常见。

当然，中国人也相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努力掌握自然的运行规律，把握自己的命运。例如，孟子就说过，“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罗兰·博尔: 看来我们正在说明“命运”这个概念在中西方观念中有哪些不同。在中文语境中, “命运”结合了——正如你所说——“命”和“运”的意思, 表明人类可以通过一致的关注和共同努力来塑造历史。相比而言, 西方人看待“命运”的思路可能更接近“fate”: 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destiny”, 因为有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决定它将会怎样。另一方面, 英文“未来”一词具有更开放的意义, 尤其是作为常用词汇表现为诸如“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人类行为可以改变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看, “命运”似乎具有“destiny”和“future”之间的意义。因此, 这两个术语的翻译不同。但在我看来, 在讨论这个术语时保持当前这两个意义——在“命”和“运”, 或者在“destiny”和“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之间是很重要的。

臧峰宇: “fate”和“destiny”这两个词的意思确实很接近, 但也有些细微的差别。正如你所说, “destiny”在西方人看来是由比人更强大的力量支配的, 人可以把握自己的“fate”。我们之所以坚信能够掌握命运, 是因为相信未来, 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改变未来。你从“未来”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命运”, 令我很受启发。但也要充分考虑现在, 我们不仅期待未来的命运, 更关心当前的境遇, 这是我们的命运中最现实的部分。因而, 这里体现了一种变量, 就是“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这是我们面对“命运”所具有的积极的态度。

罗兰·博尔: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 我们作为人类和人类现在共同所做的事情塑造了我们的未来或命运。我们可能不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选择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东西, 但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来塑造未来后代和社会将继承的东西。正是这个议题对中国文化如此关注, 但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到目前为止, 我们正在提出实际问题, 因为哲学不仅要求理解世界, 还要改变世界。

臧峰宇: 是的, 解释世界固然重要, 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也认为, 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把握人类的命运, 是中国传统文化命题, 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人类解放。当然, 我们要继承古往今来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在对当代问题的思考中实现综合创新。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言, 也需要理解源自西方思想史的相应理解。

罗兰·博尔: 我们还需要解决欧洲概念的后续发展问题。早期的“命运”概念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另一个阶段是漫长的基督教时期。欧洲后来是基督教化的, 尽管这要经过1000年才能实现, 尤其是在北方。一方面, 在很多欧洲传统文化中都有关于命运由诸神控制的看法; 另一方面, 尤其是当我们想起基督教神学是在古希腊哲学的交叉点发展的时候, 会发现有些较古老的希腊和罗马思想以复杂的方式进入基督教。有鉴于此, 神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个人的社会生活是由上帝决定的, 还是人类对此有些影响? 这是一场关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漫长而且仍在继续的争论。有时人们强调这一方面, 认为上帝完全决定人的生命, 导致所谓的“宿命论”, 有时强调另一方面, 认为人类在塑造他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理想的情况下, 这个张力是在一种神学辩证法中发挥作用的, 决定论导致自由意志, 以及人类希望在预先确定的世界历史中发挥作用, 当然其中还有他们自己的救赎。但维持这种辩证关系是困难的。

臧峰宇: 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都是欧洲文明的基石, 或者说在欧洲观念中总能找到这两种文化的影子。你谈到的漫长而且仍在继续的辩论实际上说明人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

对神学了解得有限，对此我想说自由意志确实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意志是一种心理活动，是有明确目的的信念，是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关系的主观反映。中国人自古强调“立志”，立鸿鹄之志，强调意志的主动性，依靠现有的条件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人无志不远，志无勤不立”，没有自由自觉的活动，不可能成就有价值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有明确志向的人是不可能“宿命”的，意志力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得到了高度强调。

罗兰·博尔：是的，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观念塑造了欧洲文明。但是，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冲击，这段历史也面临深刻的挑战。很多现代性思想都对基督教思想和文化曾占据的主导地位的挑战。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最初体现在1789年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另一个更激进——很快就变成了共产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确立了最彻底的哲学和科学基础。他们为了理解历史，对神学框架进行了彻底的挑战。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最初的大纲。我们尤其能在他们对麦克斯·施蒂纳的长篇批评中发现这一点。一方面，他们批判施蒂纳，因为施蒂纳仍然认为历史受到基督教框架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提出了基于多层次矛盾的新模型。最后，这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主要矛盾。

臧峰宇：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挑战了基督教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共产主义理论完全更新了基督教的历史解释框架。当然，理论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比如法国革命政治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你提到的他们对施蒂纳的批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施蒂纳以“唯一者”的形象颠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历史，但他创造的“我”实际上讲述了另一个基督教神学故事。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有一个结构，我将它称作历史的结构或结构的历史，它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设的关系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罗兰·博尔：处理这种张力的另一种方式是关于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讨论，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们需要明确这个术语，因为在中文中“主观”——就我所理解的而言——可能具有一种负面的意义，这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相比之下，“客观”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你能否告诉我，“主观”是否也有一种积极的意义，比如说“主观努力”或“主观能动性”？

臧峰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讨论是一个好例子。毛泽东批评的“主观”更多的是指“主观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否认客观实在性的观念论。他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要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来整顿学风。我想这里并没有一般地否定“主观”，个人的“主观努力”是重要的，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实践的两重要素，也是为毛泽东所提倡的。

罗兰·博尔：为了不造成误解特别是在中文语境中的误解，也许我们应该谈谈对历史条件的科学研究，人们的行动可以改变历史条件。或者，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1852）中说过的一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塑造历史，使之成为传承给后代的历史。列宁将这个见解向前推进一步，尤其

是在他 1914—1915 年（再次）研究黑格尔之后，这使他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在他的《远方来信》和《四月提纲》中提出，对时局进行革命的干预，对改变局势而言是必要的。

臧峰宇：是的，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是很必要的。我们应当秉持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理解历史条件的价值。人们对历史的创造既是有目的的，也是有条件的，这里确实有一个辩证法。当然，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要遵循规律，因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大概就是马克思说的，我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在这个意义上，人虽然是有限的存在，但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是万物之灵长，可以创造卓越的历史。用北宋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无一不是人们有意识干预的结果，正如列宁所强调的，革命者要干预时局，要在历史面前有所作为。

罗兰·博尔：我们似乎已经明确了习近平使用的“命运”一词的意义。一方面，它源于中国传统，具有对社会和人的存在的独特甚至确定的道路的理解，以及对人类的行为能积极影响这条道路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历史条件或历史规律在这里展开，而且必须得到科学的理解，与此同时，协调一致的有针对性的人类行为创造性地塑造了历史的本质和方向。

臧峰宇：是的，任何表述都有其确定的含义，我们应理解其本意，而不应做过度解读。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我们应着眼于人类共同的命运，摒弃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陈旧的思维观念，为人类的未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改变人类命运的观念，源自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强调遵循历史规律，实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自觉塑造历史的探索，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罗兰·博尔：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后这个概念“共同体”。我们如何翻译这个术语以及它的中文来源是什么？“共同”翻译为“common”和“shared”。在英语中，“共同”一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拉丁文词根“commun”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含义，包括协会、团契、伙伴关系和社群。它也是“共产主义”这个词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词汇略有不同的联系，正如“communism”在中文中是“共产主义”。我们可以探索的另一个方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common”这个词的重要分析。他们认为“共同”是什么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理解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这与“共同体”有什么关系？

臧峰宇：“共同体”不是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这个现代汉语词汇最早应该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中文翻译。你知道，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中用过这个概念。他分辨了“真实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批判了“货币共同体”的拜物教本质，指出未来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你指出“共同”的拉丁文词源与“共产主义”这个词的关系，我觉得很有道理。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在古代以血缘、语言和习惯为基础，在现代以契约和货币为纽带，或因物质匮乏，或因交往异化，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要建构一个未来理想的共同体。

罗兰·博尔：让我们做一些翻译研究，尤其是德文术语的翻译，它们被译成“共同体”“共同性”等。例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发现，Gemeinschaft（共同体），具有和睦、团契和社群的意思；Gemeinwesen（共同体），作为一个政体或政治组织，它具有更强的社群的意思；Allgemeinheit（共同性），意味着共性、普遍性和社群。值得注意的是，

Gemeinschaft 有时被译为集体。

臧峰宇：我也注意到你提到的三个概念在中文中通常都被译成“共同体”，研究它们各自独特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也注意到，当马克思使用“Gemeinschaft”这个词的时候，表达的不是与“Gemeinwesen”不同的意思，他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往往与其阐释语境有关。对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理解有广狭之别，在广义上，对这些概念是可以做家族相似性理解的。所以，当“Gemeinschaft”有时被译为“集体”的时候，表达的也是相似的意思。

罗兰·博尔：至于作为形容词（也是副词）的 *gemeinsam*，中文通常翻译为“共同”。这个德文词的意思是共同、一起、统一。与德文一样，“*gemein*”这个词根有很多变化和合成词，例如，*gemeinschaftlich* 也被译为“共同”，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种共同性不是作为一个既定概念出现的，而是随着人类在相互依赖中共同合作而产生的——*gegenseitige* 在德文中被译为“相互依存关系”（*Abhängigkeit*）。显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从“共产主义”演化而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术语，但它与 *human commonality* 或“人类共同体”的意思是重叠的。

然而，正如你所指出的，问题是共同体并不总是对人类有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了虚假的或“虚幻的共同体”（*illusorische Gemeinschaft*）和共产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wirklichen Gemeinschaft*）。尽管这两个词在中文中被译为“虚幻的集体”和“真实的集体”！

臧峰宇：是的，这种共同性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建构共同体是人们的现实需要，无论是在以人的依赖为前提的社会，还是在以物的依赖为前提的社会，共同性都体现为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当然，以往的共同体往往只对一部分成员有益，而不能说对整个人类有益，为此必须超越物质匮乏或交往异化的共同体。我也认为，马克思阐述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从“共产主义”演化而来的术语，反映的是一种以类的依赖为前提的社会。人们在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共同合作，相互依赖，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善品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是一种美好的冀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我觉得这个理念站在了人类命运的制高点上。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它不仅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对当今时代的社会建设也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价值

罗兰·博尔：这是在当前转向实际问题的一个极好的观点。正如你所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挑战了西方的零和博弈思路。这个设想走进西方文化的深处，对各国内部政治，例如资产阶级国家政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影响。零和博弈也被表述为“赢家通吃”，也就是说，如果我输了，你就赢了。在很多方面，它是西方矛盾观念的实际表达：只能二者选其一，是一个主导框架。尽管黑格尔确实挑战了这个假设。你可以在更早的冷战思维中看到这一点，实际上这也表明旧的冷战思想和实践以西方的断裂和碎片化的方式得到恢复，我们知道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关于它的旧的假设也在发生变化。

臧峰宇: 零和博弈体现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正如你所说, 在这个思维框架中, 二者的关系除了输赢之外, 就没有别的, 这仍然是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翻版。我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思路, 给人类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黑格尔挑战了这个思路, 提出了一种积极的辩证法。马克思将辩证法引入历史视域和实践生活, 呈现了一种富有现实性的中性智慧。冷战沿袭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遗憾的是, 在冷战结束 20 多年来, 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仍然存在。但是, 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表明, 任何单一国家都不能解决世界历史中的难题, 为此需要共赢与合作的思维。

罗兰·博尔: 第一步是耐心地提出另一种对全球关系的看法。习近平一直鼓励中国人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这意味着要仔细、耐心地解释和提供一种来自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框架作为替代方案, 并一次次地讲出来。

臧峰宇: 是的, 中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正在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国际学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你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令我十分赞赏, 其中关于中国发展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富有真知灼见。

罗兰·博尔: 我们这个时代显而易见的一个特点是,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开始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作用, 中非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和其他国际项目也发挥了作用。结果是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的行动思路, 而不仅是理论思路。

臧峰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它正在变成现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着眼于共同的命运, 已经携手合作共创未来。它还具体表现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欧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它有益于人类的未来, 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一个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共同体。

罗兰·博尔: 我认为重点是“一带一路倡议”, 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虽然它于 2017 年在北京被正式提出, 但实际上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在我看来, “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问题包括: (1) 与周恩来总理最初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2) 马克思主义对改善所有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需要的关注; (3) 它如何在具体层面揭示“双赢”的真正含义; (4) 是否有可能超越经济学的“基础”, 包括上层建筑, 例如文化、哲学、意识形态等元素。

臧峰宇: 是的, “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我同意你的看法, 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注, 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当代遵循, 是一项能够实现“双赢”的倡议。此外, 它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有关。2000 多年前, 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影响很大, 实际地促进了与沿线各国经济和文化的往来。后来, 在历史上陆续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商业与文明交往之路促进了东西方对话与交融, 成为一部浓缩的世界史片段。

罗兰·博尔: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看, 最重要的特征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它彻底重新定义了主权的概念与实践。西欧的定义通常由威斯特伐利亚发出信号。1648 年, 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之后,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在欧洲各国互相承认和互不干涉。总的来说, 他们开始这样做, 现在战争必须以其他的事情为理由。但这只是发生在他们之间。这

些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殖民扩张，完全无视其他地方的主权。

臧峰宇：主权是国家的固有权利，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一律平等，这是国际社会的常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一系列欧洲宗教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欧洲国家对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的认同。但殖民扩张打破了这种常识，“弱国无外交”，以各种理由侵犯弱国和小国主权的行在近代理史上十分常见。这种情况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而得到改变。反对殖民者的统治，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早已成为曾做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自觉意识。

罗兰·博尔：是的，当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国家在 20 世纪实现了解放和独立，他们接受了主权概念，并将其重新定义为反殖民的主权。现在主权意味着离开被殖民的自由是一种权利，禁止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而且领土完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原则可以在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找到，它首先由苏联提出并于 1960 年通过。这段历史还有另一个转折：虽然中国直到后来才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但恰恰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议影响了联合国宣言。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遵循这种反殖民主权的做法。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的所有协议的基本特征是，尊重各国的主权是这些协议的应有之义。

臧峰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 1953 年 12 月第一次提出的，得到中国、印度、缅甸政府共同倡导，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项原则影响了联合国非殖民化宣言，推动了非殖民化机制的发展。正如你所说，在 20 世纪实现了解放和独立的国家强调的主权概念内在地具有反殖民的意义。“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力图打造各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这项倡议充分考虑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切实推动政府间合作和各项民间合作，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平台。

罗兰·博尔：“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注，即改善所有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为依据。这需要解放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特别强调的重点。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维度有很多话可以说，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是这种解放生产力的国际化，甚或全球化的一种形式。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应该简单地复制中国的做法，而是应该能以自己的方式和中国合作来解放生产力。

臧峰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为此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一带一路”确实体现了一种解放生产力的国际化形式。正如你所说，这不是建议做一种简单的复制，而是倡导各国在合作互助的氛围中促进共同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向世界表达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愿意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这符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

罗兰·博尔：“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一特点使它与其他形式的国际“援助”截然不同。这些“援助”往往采取金融救济的形式，这取决于受援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换句话说，是对受援国的干涉。此外，以前的“援助”模式对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作用微乎其微。很少涉及基础设施和合作开发，因此这些以往的殖民地国家发现自己仍然贫穷。“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有关国家的青睐。

臧峰宇: 是的,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 与传统的“援助”不同。其中有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和合作开发项目, 得到很多沿线国家的欢迎。我曾在埃及真切地感受到当地朋友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们都把对方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机遇, 都在积极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正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人们对未来发展有了进一步憧憬。当然, 也有些国家对此不乏疑虑。

罗兰·博尔: 第三点涉及“双赢”解决方案的重要思想和实践。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 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 尤其是在西方传统中, 正如前面所说的, “零和博弈”是基础。作为一个外国人, 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双赢”。你能解释一下中国传统思想和习近平强调的内容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你最近写了一本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书。

臧峰宇: “双赢”理念更新了人们对交往关系的理解, 交往双方并不都是输赢关系, 那种习惯于将对方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的思路应当成为过去。“零和博弈”体现了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西方观念, 但这不是一个好游戏。我最近写了一本书《文化自信与文化繁荣兴盛》,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做了初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各国相互合作、互利双赢。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大会上, 他指出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 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这种以双赢取代零和的思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

罗兰·博尔: 最后一点涉及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层面,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是相对容易的。经济合作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因为商业就是商业。但是当我们处理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 问题就变得有点复杂了。除了与西欧文化有很多差异之外, 中国文化与非洲文化、太平洋文化、土著文化、拉丁美洲文化等也有很多差异。你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在这个层面上相互学习?

臧峰宇: 确实, 上层建筑层面的问题比较复杂。今天,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各国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上相互学习借鉴, 首先要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其次要尊重各国的文明和文化习惯, 还要掌握正确的思路与方法, 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 使文化发展超越时空和国度。我们要在古今中外多重维度实现文化交融与对话, 在比较哲学研究中探究一种面向未来的世界哲学。我想这也体现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境界。

责任编辑: 曾昭贵